

“国家分配论”的学术史考察及相关争论

张 馨*

内容提要:“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化改革前期的主流财政理论,在我国财政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我国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从“国家分配论”的概念入手,依次探讨了“国家分配论”的产生和提出过程,得出“国家分配论”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厘清一些质疑“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和争论,最后对“公共财政论”是否为“国家分配论”的坚持和发展作了回答,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的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国家分配论 财政理论 财政学说史 中国财政学

作者简介:张 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教授,361005。

中图分类号:F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2)06-0005-20

对于现今年轻的财政学子来说,“国家分配论”似乎已是如烟往事,并不值得关注,但这一理论在我国财政学说史中,则代表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潜在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化改革前期,它雄踞财政理论主流地位约30年;在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后,它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革仍有着重大影响。尽管该理论提出已有六七十年,但它的影响没有过去,它的争议没有过去,它的若干谜团没有揭开,它的某些提法没有澄清,还常常困扰着我国的财政研究和财政实践。

本人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学习财政学,此时“国家分配论”已创立了20多年,因而也是一个后来者,但从80年代初开始,本人就一直处于“国家分配论”争议的旋涡之中和风口浪尖之上,长达几十年的耳闻目睹和学习钻研,都使本人对于该理论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有必要对“国家分配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论述”,对其基本问题进行“评价”,从而有了这篇评述“国家分配论”的文章,兹以一己之见就教于财政学界方家与同仁。

一、什么是“国家分配论”?

介绍和探讨“国家分配论”,首先要解答的显然是“什么是‘国家分配论’”的问题,否则连什么是“国家分配论”都没弄清,怎么探讨?

* 张馨电子邮箱:zx@xmu.edu.cn。

具体来看,这一问题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家分配论”的概念定义;二是关于“国家分配论”的基本内容。这两个问题,几十年来都没有引起争议,专文介绍分析的也很少。许廷星和邓子基是“国家分配论”两位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下面具体介绍之。

(一)“国家分配论”的定义

邓子基(1962a)指出,财政本质“乃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社会形态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简称为财政分配关系”。许廷星等(1986)的表述是:“社会主义财政,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分配关系。”

上述两种表述存在一些差异,如邓子基多了“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许廷星则多了“一系列的”等词语;双方有些具体用词不同,如“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差异;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实质性的。

以上两种表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共同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们都没有明确给出“国家分配论”的定义,而只是对于“财政本质”的表述。换言之,这是以财政本质定义代替“国家分配论”定义。尽管财政本质问题分析是“国家分配论”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以财政本质的观点和分析代表“国家分配论”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毕竟不是完整明确的“国家分配论”的定义。“财政本质”概念在我国财政理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早在1949年千家驹就指出:“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财政现象的研究上,立刻使我们和束缚于旧方法中的讲坛学者们不同,循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使我们能揭露出财政现象的本质,发现其无限错综和丰富的内容。这是创立新财政学之路。”(千家驹,1949,第22页)因此,采用“财政本质”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展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后,“财政本质”一词成为财政理论的专用术语和核心概念,在“国家分配论”的相关论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它们都包含“国家主体”和“分配关系”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换言之,邓子基和许廷星都认为,只有国家主体和分配关系两个要素的结合才是“财政”,两者缺一不可,不具备这两个要素的任何活动都不是财政。邓子基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可以“简称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2,第33页)。

总之,“国家分配”就是“财政”,反之亦然,所以该理论被冠以“国家分配论”之名。整个“国家分配论”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构建形成的。

(二)“国家分配论”的体系内容

相对系统明确地阐述“国家分配论”的体系内容的论著,首先是《社会主义财政学》(第二次修订本)给予了相关论述(《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7);^①其次是邓子基(1989)的《财政学原理》,该书“第一章”名称就是“国家分配论”,这是第一次明确地冠之以“国家分配论”之名的论著。两书所给出的“国家分配论”体系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家学说基础之上,整个分析论证和结论都处于这一基本框架之下。为此,财政学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框架下,从原始社会末期没有国家、没有财政,生产力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和阶级的产生开始,然后阶级国家产生,需要实现自身职能的物质资料,但国家本身是非生产性机构,只能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力从社会再生产

^① 《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7)的“导论”和“第一章第二节社会主义财政本质”。

过程中攫取和使用所需的物质资料,这就产生了财政。然后是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与财政相伴共同发展演变过程的分析与介绍,给出了财政与国家生死相依的历史脉络。^①

第二,财政是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这是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介绍社会主义财政如何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进而分析社会主义财政与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分配关系,得出财政是一种特殊分配关系的结论。^②

第三,财政与国家具有本质联系。“国家分配论”的体系内容基本上围绕着“财政本质”展开。财政与国家具有本质联系的“具体表现是:(1)财政与国家同‘生’同‘死’,同时产生、发展和消亡。(2)作为经济基础的财政分配,直接为国家提供了保证它生存、发展和实现职能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生产领域要将物质提供给国家,则只能通过国家本身的参与分配来做到。没有国家这一分配主体,财政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3)国家本身不从事物质生产,但又要物质来满足自己实现职能的需要,这是国家参与财政分配的动机,是财政同国家产生本质联系的直接原因。(4)财政分配是凭借政治权力进行的,强制性和无偿性是财政分配的本质特征。(5)财政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作为分配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阶级性。此阶级性与国家的阶级性是同一性质的,并且表现为不同阶级统治的国家所进行财政分配具有不同的阶级性。”(邓子基、张馨,1984)

第四,财政只与国家具有本质联系。如果说上一点财政与国家本质联系具体表现的介绍,是“国家分配论”正面阐述自身观点,那么,这一点则是“国家分配论”为自身观点的辩护和对其他观点的反驳。在这种辩驳中,“本质联系”一词是“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概念,在解释财政与国家的关系时起着关键和根本的作用。所谓“本质联系”就是必然联系,是有你就有我,没你就没我的;说财政与国家有本质联系,意味着财政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互依存、互不可缺。然而,其他观点也相应指出,财政与社会共同需要、与剩余产品、与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分配等,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与财政也具有本质联系。如果这些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财政只等于“国家分配”的命题就不成立了,“国家分配论”也就不成立了。对此“国家分配论”强调指出,只有财政才与国家有“本质联系”,其他的事物与财政都不具有本质联系。邓子基通过“本质联系”的分层次分析论证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列宁说过‘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可见,本质是分层次的,……要确定财政的本质就要分析较深一层的本质,这较深一层的本质联系只能是一个。”“要从财政中找出一个‘本质联系’来,就要把非较深层次本质联系的东西去掉。”通过层层“剥笋”分析,他的结论是,财政这个事物同国家、再生产、剩余产品、价值等都有密切联系,但只有“较深层次”的与国家的联系才是“本质联系”,这就解答了其他各派针对“本质联系”问题的质疑,“国家分配论”也就站稳了自己的根基。^③

第五,财政活动的四个基本要素,即财政主体是国家;财政分配对象是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主要是剩余产品;财政分配形式有实物、力役和价值,近现代以来主要是价值形式;财政分配目的是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④

进行了上述分析论证之后得出了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结论。

① 如对这些介绍和分析有兴趣,可参见《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7)的“导言”。

② 如对这些介绍和分析有兴趣,可参见《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7)的“第一章第二节社会主义财政本质”。

③ 如对这些介绍和分析有兴趣,可参见《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7)的“第一章第二节社会主义财政本质”。

④ 如对这些介绍和分析有兴趣,可参见《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7)的“第二章第一节”。

二、“国家分配论”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对于我国财政学界始终是不那么清晰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师们说的都是,“国家分配论”是在否定了“货币关系论”之后形成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又不能那么绝对。就“国家分配论”而言,其内容观点、体系框架、论证方法、逻辑思路和核心命题等都是非常独特的。一方面,它与古典财政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这不奇怪;另一方面,它却是否定苏联财政理论的产物,是在大力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就令人困惑了。所以,如果仅停留在否定“货币关系论”的产物这一认识层面上,就未免失之肤浅。“国家分配论”仅产生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绝对是一个中国自己独特的财政理论,有着绝对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探讨“国家分配论”的来源,如果仅盯着外来的“货币关系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回到中国当时具体的内部学术环境上来。

(一)阶级财政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存在于我国的是旧财政学,它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的全新的财政学是迥然相异的,但它也是从国家(政府)收支的角度去分析和论证财政活动,也提到“国家主体”、“财政本质”等词。当然,这是“公共”国家而非“阶级”国家,是“公共”财政而非“阶级”财政,^①所以它不是“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国家分配论”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扬弃公共性质的“国家经济论”,而逐步转到阶级性质的国家分配本质观上完成的。

我国财政学界创立“国家分配论”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到千家驹的《新财政学大纲》(千家驹,1949,第21—22页)。该书出版于新中国成立的同月即1949年10月。该书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财政学,标志着我国新财政学的开端。“在着手创立新财政学的时候,……关于各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的知识,关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都成为我们研究财政学时的方法论的出发点,而应用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方法,特别是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方法,——唯物史观的方法,唯物辩证法,便是我们最主要的武器。”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是此后形成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财政学的直接原因,它使得我国财政理论与实践转到阶级观点上来。千家驹(1949,第7页)指出:“财政是国家的经济,即为着维持这统治工具的存在和发挥这统治工具的职务而必须有的经济”。据本人所掌握的资料,以“阶级国家经济”来界定财政,这在我国应是第一人。但该书还不是我国意义上的“国家分配论”的提出,因为该书所认定的财政,仅是“阶级国家经济”而不是“阶级国家分配”。

1951年8月同时出版的伍丹戈的《论国家财政》与丁方和罗毅的《新财政学教程》,也同样采取了阶级国家概念来分析财政问题。1953年尹文敬的《国家财政学》一书,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财政的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区别:“财政既是在实现国家职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于是国家的本质规定了财政的本质。在阶级社会里,财政很明显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工具。资本主义财政学家,为要隐蔽财政的阶级性与剥削性,硬说政府是为公共服务的,财政是应公共的需要而发生,把它称为‘公共财政’或直接称为‘政府财政’;他们不敢触及国家本质,甚至连国家一名词,也避而不用;他们仅仅罗列一些财政现象,推论一些收支技术问题。这种混淆是非的理论,是不足以说明财政的真义的。”(尹文敬,1953,第6页)这段话清晰指明了“国家财政论”与“公共财政论”争论的根本焦

① 这些内容可参见以下旧中国的财政学:陈启修(1924,第1页);姚庆三(1934,1934,第1—2页和第4页);何廉和李锐(1935,第1页);尹文敬(1935,第1页);曹国卿(1947,第1页)。至于“财政本质”一词,则已出现在钱亦石(1935,第4页)。

点,就在于“阶级性”和“公共性”的分歧。在这里,“公共性”成了“阶级性”的绝对对立物,两者似乎是不共戴天的。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讲阶级”“不讲剥削”一直是“国家分配论”否定具有公共性质的财政理论,如“社会共同需要论”和公共财政论的强有力武器。

(二)分配关系观

“国家分配论”的两个基本要素“(阶级)国家主体”和“分配关系”,分别构成了该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主线。其中“国家主体”这条主线又粗又大,并充满争议;“分配关系”这条主线则相对细小,它平静地为我国财政学界所接受。两者在各自发展中整合交融,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分配论”。下文将探析财政的分配关系观在我国形成过程。

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的观点,叶振鹏在1953年前后就提出了。针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货币关系论”,他认为关于财政本质是货币关系的提法是错误的,财政本质应是一种分配关系。因为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都存在货币关系,但按照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非生产性的观点,财政活动只能存在于分配环节,财政只能体现为分配关系。否则,人们无法将财政与各种非分配的货币活动区分开来。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①

由于“货币关系论”是从苏联引入的理论,分配关系观一出现就受到了围攻、压制和批判,因为它否定和反对了苏联的理论。正因如此,这一观点在当时难以公开发表,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和争论,也就谈不上对于创立“国家分配论”的贡献。

首次公开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的是许廷星,他在1957年《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一书中,明确地将财政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即国家的分配关系。他指出,研究财政对象问题时从“货币关系”入手,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这促使他“大胆地从货币关系的圈子里钻出来并从分配关系来试图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许廷星,1957,第1页),接下来本文都从分配关系角度来探讨财政问题。相对于“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观显然较为正确。随着许廷星观点的公开提出,其很快在财政学界得到呼应,并得到普遍认可,成为“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立足基点与理论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数十年中,“分配关系观”一直置身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论之外而未受到触动,这与“国家分配论”的另一立足基点与理论支柱,即国家主体观一直受到强烈的质疑和争议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国家分配观

就目前所能发现的材料而言,1951年伍丹戈的《论国家财政》与丁方和罗毅的《新财政学教程》,都包含最初的国家分配观。伍丹戈的第一句就是:“国家财政不单单是历史的产物,它在社会分裂了阶级和国家形成以后产生,将来又要随着全世界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且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与改变,每一次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国家政权构成的变更,也变更了财政的内容和形式。在氏族社会,真正的国家财政是没有的,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国家。”(伍丹戈,1951,第1页)

这段话是该书的中心思想和核心内容。尽管没有使用“分配”“国家分配”等字眼,但书名就是“国家财政”,其具有的几个特点对以后几十年我国财政理论,尤其是对“国家分配论”有着重大影响:(1)紧密联系国家来谈论财政问题;(2)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财政理论上的扼要运用,全书大量引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的相关论述;(3)它实际上就是30年后我国财政学开头章节的内容简介,与以后“国家分配论”的财政与国家有“本质联系”的相关分析几乎是一样的,此后“国家分配论”财政与国家关系的著述,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财

^① 这一观点至今没有留下正式的书面材料,只是依据本人对当事人的当面调查材料整理形成。

政学教科书,都处于这种论述的框架和模式之中,只不过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已。

如果说伍丹戈的国家分配观是单一的和简陋的,那么,丁方和罗毅的《新财政学教程》关于国家分配观的论述就大为丰富了。其要点如下。^①

(1)该书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财政是什么?简单地说,财政是国家在满足它的需要上,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行为。它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流出流入于国家机构,构成国家的收入支出及收支管理与运用等各种经济行为的总称。”这一“财政”概念已明白无误地包含了“国家”和“分配”这两个“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要素,强调了财政是国家为了“满足它的需要”而分配所产生的行为。(2)“由于国家是历史上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财政具有一定的阶级本质。它不是超阶级而永恒存在的。因此,我们了解财政,要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出发。”在这里,国家是阶级国家,财政是阶级财政。(3)该书将财政与国家本质、国家职能以及国家权力行使直接相联系,强调“财政,这国家的经济行为,与一般的经济行为是有区别的……国家的经济行为,虽也有少数的买卖行为,而大部分却是以权力行使参与分配再分配过程为特点。它既不是双方的自愿,也不是等价交换的买卖行为,而是一种行政力量,单方的向人民征收人力财力物力”。这就是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地无偿地进行分配。(4)“人力物力财力是国家行使政权不可少的条件,国家财政便是以这些社会财富——人力物力财力,为收入支出管理和运用的对象。”其后“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分配形式的分析深化了这一论述。(5)“经济决定财政”,“经济对财政反作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中,都有整整一大章分析经济与财政的关系。

上述这些论述,几乎已经包含了其后“国家分配论”最主要的要素和最基本的内容,1997年本人最初接触到丁方和罗毅的这本书时,第一感觉就是这是“国家分配论”的提出,所以在《公共财政论纲》(张馨,1999)中提出,他们才是“国家分配论”的最初提出者。现在看来这一看法并不妥当,因为他们只是简单涉及“国家分配论”的若干核心观点,还不是一种理论的形成。在他们那儿,更多的还只是“国家主体”观点,尚未上升为国家分配理论。

(四)“国家分配论”的形成

接下来尹文敬的《国家财政学》对此有了较大的突破。该书一开始就指出财政学是研究国家收支的科学,接着从原始社会谈起,指出当时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剥削和阶级,没有国家,自然就没有财政。后来生产力发展,就有了剩余产品、剥削和阶级,有了国家,也就有了财政(尹文敬,1953,第1—2页)。这段论述以后,“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起源的论述大体是以此为蓝本的。^②

许廷星(1957)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对生活的物质资料的分配。”许廷星已经明确了国家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因此该书在“国家分配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该论的正式确立。很快地,其他学者也纷纷加入“国家分配论”构建行列之中。王传纶(1958)从“特殊本质”角度指出:“财政的特殊的本质只能归结为国家对社会产品的分配。……财政学应当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国家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中所形成的诸种经济关系。”他还指出:“和财政现象的发生有本质联系的,乃是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人们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本质联系”一词去描述财政与国家的关系。赵春新(1961)强调了“国家权力”和“无偿方式”:“这种依靠国家权力,基本上采用无偿方式,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成员中征集一部分物质资料,由国家集中分配,以满足国家的消费需要而形成的产品分配关系,即是国家财政分配关系。”

① 以下这5点引文见丁方和罗毅(1951,第3—6页、第9页)。

② 参见《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1982,第2页)、邓子基(1989,第9—10页)。

胡鉴美(1962)的表述更为准确完整:“财政这一经济范畴,具有两个必要的因素:一、国家;二、分配关系。……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它的本质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而与有关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财政与国家及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这两个因素发生本质联系。”但他认为财政与国家和社会产品分配关系都发生本质联系,这与其后“国家分配论”主流观点强调财政只与国家有本质联系是不同的。

邓子基于1962年连续发表3篇“国家分配论”性质的文章(这点后文将详细介绍)。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国家分配论”的系列文章,对于“国家分配论”的发展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这些都表明,在几年时间内“国家分配论”的羽翼开始丰满。1961年8月21日《光明日报》第4版梦蟾的《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1962年1月26日《大公报》第3版庆理的《关于财政实质等问题——一年来经济学界讨论意见综述》等综述性文章,都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分配论”的咄咄逼人和“货币关系论”难以招架的状态,“国家分配论”取代“货币关系论”主流地位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五)主流地位的确立

1964年8月,财政部在辽宁旅大市^①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即我国财政学界著名的“大连会议”。这是财政本质及其相关理论的第一次大论战,也是我国财政学界最终摆脱苏联财政理论束缚,开始独立构建自己财政学的标志,还是“国家分配论”最终确立其主流地位的标志,对以后我国财政学界的影响极其巨大。

“国家分配论”在会上占据绝对优势。在会后出版的《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中,主张“国家分配论”的论文占了多数,是此时“国家分配论”占据我国财政理论主流地位的鲜明表现。如沈云,陈共,谷祺和刘明远,赵春新,翟华林等的论文都持这一观点。此外,许毅尽管没有向会议提交论文,但旗帜鲜明地主张“国家分配论”,在此后几十年中他一直是“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6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著的《财政学(初稿)》一书出版,这是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基础的第一本财政学教科书。一般来说,教科书反映的是本学科领域较为成熟和普遍的研究成果,它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国家分配论”在我国财政理论界的成功。

上述研究均意味着“国家分配论”占据了我国财政学的主流地位。

三、谁提出了“国家分配论”?

在“国家分配论”提出、形成、发展并延续至今的六七十年中,出现了若干令人困惑的谜团,其首要的就是“谁是‘国家分配论’提出者”,即“第一人”之谜。下文重点讨论与此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尹文敬、许廷星和邓子基三人的贡献。

(一)尹文敬是主要奠基者

1953年尹文敬出版了《国家财政学》一书,这是以鲜明的国家分配观立论开篇的财政学教科书。在书中,他论述国家分配问题已不是只言片语,而是较为系统的看法,通观全书持有的国家分配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②

首先,非常明确地以“国家与财政的产生”作为全书的切入点。这一切入点鲜明地体现在全书

^① 1981年,旅大市改称为大连市。

^② 以下四点的引文均见尹文敬(1953,第1—2页)。

的篇章结构上,即其“导论”的第一节“国家与财政”。它的第一大点就是“国家与财政的产生”,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财政学是研究国家财政收支活动的科学。”接下来的财政与国家关系分析是详细的和系统的。整个大点的阐述,层层递进,丝丝入扣,先是论述了国家的产生,进而指出国家为了实现自身职能的需要而产生财政,需要财政的存在,等等。这就从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上紧紧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其次,非常明确地指出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自身职能需要而产生的。他是这样分析的:在“原始共产社会,……生产力薄弱,不可能有剩余生产物以供别人剥削。……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既无国家,自然也没有国家财政。……后来生产进步,……产生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就产生了“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和国家。“国家为了实现它的各种职能,必须有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它既不能自为生产,便不得不对被统治阶级作劳力、实物或货币的征收,财政便随着国家这种物质需要而产生。”这里实际上分析了国家为了实现自身职能而参与分配,导致了财政产生的问题。

再次,非常明确地指出财政与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关系。“财政本身既是为国家物质需要而服务,以便利国家职能的实现,保证物质资源的供给,基本上它又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权力而行使的,所以国家的本质,决定了财政的本质。它与国家亦步亦趋密切结合,随着国家的发生发展而发生发展,将来也会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灭而消灭。”这种对于国家与财政共同产生和消亡关系的阐述,已经是多年后所谓财政和国家“同生同死”经典名言的表述。

最后,非常明确地指出财政是阶级国家的活动。该书所分析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是“阶级”国家。在整个分析中,尹文敬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贴切地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来介绍国家的产生和消亡、国家的捐税活动等,从而鲜明地将财政限定为阶级国家的活动。

尹文敬(1953,第3页)总结道:“国家为了要实现它的职能,就必须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就自然要发生国家财政,在历史上所有的国家形式,都是这样的。”此后全书都是在这一财政定义的基调下展开论述的。

几十年后,当重读我国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时,几乎开篇的论述都与尹文敬的这些论述极为相似,其踪影几乎无处不在,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该书对我国财政学的持久影响力。该书关于财政的产生、财政与国家履行职能的关系、国家对财政性质和内容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财政依靠国家强制权力进行活动等分析,都是此后几十年“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论点和内容之一,并且至今仍未过时。

分析至此,本人认为,“国家分配论”的提出应当充分考虑尹文敬的贡献,他对其后“国家分配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该书尚未具体分析和论证财政分配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分配”等命题。换言之,他的贡献仅限于“国家主体观”,而缺乏“分配关系观”,更没将两者结合成为“国家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因而还难以说他是“国家分配论”的“第一人”,但说他是最主要的奠基者,应该是可以的。

(二)许廷星是“第一人”

在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那儿,关于“第一人”说得最多的是许廷星。下面看看他的“国家分配论”开篇之作《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的基本观点。

第一,“分配关系观”。该书“序言”一开始就指出,该书研究财政学的对象问题,依据的是当时主流理论即“货币关系论”,“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生很多问题不好解决”,转而从分配关系角度来研

究问题。

第二,“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要点。(1)明确使用了“以国家为主体”一词,使用了“国家主体”和“分配关系”去界定财政概念,即“一般经济的分配关系是以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主体,财政的分配关系是以国家为主体。”(许廷星,1957,第25页)这是其后几十年我国财政学最基本的用语。(2)财政与阶级和国家的不可分性。“原始公社时期,既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自然也就没有国家参与社会的物质资料分配的财政存在。”“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后,有了国家,也有了财政。”“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和国家,也就出现了财政,阶级和国家不存在,财政也就随之不存在。”(许廷星,1957,第6—8页)概而言之,财政与国家是“同生同死”的,但没有明确加以总结,更没高度关注和强调,只是一般性论述。对于财政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年多后,王传纶使用了“本质联系”一词概括之,多年后又被概括为“同生同死”,前者是学术名词,后者则是通俗用语,两者相得益彰。(3)“财政与国家职能是不可分的。”(许廷星,1957,第7页)“如果没有国家存在,也就没有国家职能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存在,也就是没有财政分配关系的存在。”“财政之所以必须同国家职能联系起来理解,是因为随社会生产关系的转移,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随国家的性质不同及其职能的不同,财政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财政的分配关系也有广狭的不同。”(4)指出财政作为分配关系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财政所表现的分配关系之所以与一般经济关系所表现的分配关系不完全相同,是因为经济的分配关系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的分配关系,而财政的分配关系则是从国家职能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前者表现在经济的领域,后者既表现在经济的领域,同时也表现在非经济的领域。”(许廷星,1957,第9页)

尹文敬对“国家分配论”的“国家主体观”的形成具有奠基性质,在许廷星的论述中留下了较多的痕迹,但许廷星与尹文敬相比有以下的观点创新:(1)许廷星将财政收支活动归结到特殊分配关系的基点上,进行了大量论述,这是它与《国家财政学》的最大差别。这种对分配关系的强调,主要是服务于强调财政的阶级性,也是对“货币关系论”的批驳。(2)《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第一次公开质疑“货币关系论”,以大量篇幅批判了“货币关系论”,其内容还成为全书的重点。这是我国财政学界对“货币关系论”最初的系统批判,而《国家财政学》则没有提到“货币关系论”。在当时主流理论是“货币关系论”的背景下,只有破旧才能立新,没有对“货币关系论”的否定,就没有“国家分配论”的崛起。这是许廷星对“国家分配论”的最大贡献。(3)在“国家分配论”的形成上,尹文敬的贡献主要在国家与财政关系的分析上,而许廷星的贡献则将国家主体与分配关系结合起来,两大基本要素有机地结合在自己的理论之中,从而正式确立了“国家分配论”。

当然,许廷星还没有从“本质联系”或类似的角度和深度去探讨财政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其分析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但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核心概念已经提出,基本内容已经具备,因而他被称为“国家分配论”“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邓子基2008年在《财政研究》第6期发表《学术前辈 首倡有功》一文,肯定了“许廷星于1957年首先提出‘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的历史功绩(邓子基,2008)。

(三)邓子基是集大成者

相对于许廷星,邓子基是“国家分配论”的后来者,他第一次正式发表“国家分配论”文章已是1962年了。在《学术前辈 首倡有功》一文中,他指出:“我作为后学,对许教授十分崇敬,彼此感情甚笃。许教授首倡的‘国家分配论’基本观点,使我很受启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人生。”(邓子基,2008)但是,许廷星是“第一人”,并不意味着邓子基在“国家分配论”的创立发展过程中是无足轻重的。相反,他是该论的集大成者,并将该论相对系统化、体系化和完善化。

1962年邓子基发表《略论财政本质》、《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和《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三篇关于“国家分配论”的论文(邓子基, 1962a, 1962b, 1962c), 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略论财政本质》。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国家分配论”文章, 对“国家分配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也一炮打出了他在财政学界的名声。

邓子基(1962a)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1)给出了财政本质定义, 即财政本质“乃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社会形态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 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 简称为财政分配关系”。他进而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命题。这就总结归纳了“国家分配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 其后该理论的全面深化拓展就围绕着这一概念和命题进行。(2)该文对于财政本质的各个基本要素, 如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 财政是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 财政分配的无偿方式等, 都大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语录予以支持和证明, 从而显得相对雄辩有力。而其他“国家分配论”者的论著在这方面是逊色的。其后, 他将这三篇论文修改补充整合成《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与范围问题》一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65, 第122—145页), 提交“大连会议”, 产生了重大反响, 这些都使他在财政学界崭露头角, 开始登上财政理论制高点, 成为“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83年, 邓子基发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一文, 其中新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通过分层次的本质联系, 得出财政只与国家具有“本质联系”, 而与再生产、剩余产品、价值等只有密切联系, 而没有“本质联系”。(2)指出财政与国家本质联系的含义: 一是财政与国家同生同死, 互为基础和前提; 二是国家为保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为满足实现自身职能的需要, 必须凭借政治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 三是财政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有了国家就有财政; 四是国家性质决定财政性质。(3)突出了财政分配所独有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两个本质特征, 用来作为区分财政与其他经济范畴的根本标志, 这就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国家分配论”。这样, 他就对财政本质问题做了详细大量的阐述, 大大补充深化了关于财政本质的看法, 是“国家分配论”观点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代表着“国家分配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已经成形和基本完善。

总之, 这一时期在“国家分配论”的建设上, 邓子基是相对最为突出的, 是“国家分配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是该理论的集大成者, 估计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将邓子基说成“国家分配论”“第一人”的根本原因。

四、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

关于“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性质的财政理论, 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分歧, 这里谈的是本人看法。之所以说“国家分配论”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理论, 不是因为它强调财政是“国家分配”, 而是因为它与计划经济体制本性相吻合。

(一) 时间上吻合

这种吻合, 首先表现在它与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巩固、发展、变化乃至退出上几乎是一致的。这不是巧合。

尹文敬的《国家财政学》出版于1953年, 其中的国家分配观并没引起经济理论界的留意和关注, 并且该书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此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 计划经济体制刚开始建立, 国家分配观还缺乏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的支撑与扶持, 未能生根发芽就不奇怪了。此时的“国家财政”类型尚缺

乏现实的经济基础,兼之当时全面学苏联,主要接受的是苏联的“货币关系论”,国家分配观没有反响就毫不奇怪了。

许廷星(1957,第1页)的“国家分配论”思想最初产生时间按他自己所说:“关于财政学对象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55年的下期,而于1955年底和1956年初完成初稿。”这个初稿出版于1957年5月,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于1956年,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标志性年份。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的时期,也是“国家分配论”正式提出的时期。该理论提出之后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影响迅速扩大、扩散。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健全,国家已将整个国民经济置于自身的直接控制、安排和指挥之下,财政也成为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手段,强调“国家”分配的理论有了现实基础,“财政本质论”依据此时已形成的“国家财政”实践得到很好的总结,“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大为扩展。

1964年的“大连会议”确立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而同一时间,经历了“大跃进”的波动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实施,国民经济状况已大为好转,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巩固和稳定下来,开始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黄金时期,这也是“国家分配论”的鼎盛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家分配论”最终成形并达到最高峰,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理论编写了财政学全国统编教材,整个财政学教学转到“国家分配论”的基点上来。但“国家分配论”也开始受到“社会共同需要论”等理论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并且呈现前者影响下降而后者影响上升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基本的和主要的是计划经济性质的,但改革开放已使之愈益朝着市场化方向变革,财政基本理论的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此时的经济体制状况。

随着1992年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公共财政论”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壮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取得了主流地位。当然,“国家分配论”作为一种理论仍然存在,但受到关注的程度愈益下降,不再居于主流地位,不再指导财政实践活动,也不再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财政学的教学和教材也转到“公共财政论”基础上了。

总之,从时间上看,“国家分配论”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同生同退”的关联性,计划经济基点上产生的财政理论能够不具有计划经济性质吗?

(二)与体制的计划运行高度契合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掌控一切的体制运行格局和作用机制,与“国家分配论”绝对地强调国家对于财政的作用是高度一致的。

将财政与国家或政府联系起来,并不是“国家分配论”的专利,从亚当·斯密开始,所有的财政学都是分析国家(政府)收支活动的理论,因此,仅仅依据强调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就断定“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性质的理论,既流于武断,也有失偏颇。要说明“国家分配论”的计划经济性质,就需要弄清此时经济体制和财政类型的基本特征与运行状态,才可能明了两者的特殊契合性与不可分离性。

1.“国家分配论”与“国家财政”类型的天然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国家分配论”只能确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只能借助计划型“国家财政”类型来最终确立自己的主流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国家财政”类型的特殊内容。

计划型“国家财政”类型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1)财政只为“国家”自身的经济活动服务,而不是为独立于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家的行政附属物,个人是企业的行政附属物,都不是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整个社会以国家

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整个社会再生产活动表现为仅是国家的活动。相应地,此时的财政只是国家自己为自己服务的“国家”财务。(2)财政是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因素,而不是弥补市场失效的外部条件。此时财政是“国家”筹集和供应整个社会的建设资金的主要手段与基本来源,这是生产建设型的“国家”财政。(3)财政是国家直接否定,而不是尊重企业和个人独立性的财力手段。此时整个社会各个企业的财务通过统收统支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以财政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财务。此时财政直接成为国家这个大企业的财务部门,是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组织者在财力方面的体现,也只能是生产经营组织者自身进行财务运作的“国家”财政。“国家分配论”将财政活动的一切都归结到“国家”上,就非常贴切地从理论上总结归纳了此时财政的计划经济本性。

2. “国家分配论”确认了财政对整个社会财力的计划掌控

计划经济的体制特征是“计划”,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计划控制和支配。它具体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计划安排、指挥、调节和监督。相应地,财政是国家掌控和运用整个社会财力的基本工具与核心手段。通过综合财政计划,国家对整个社会财力进行计划安排、控制、指挥和监督。此时国家预算不仅是国家的基本财力计划,还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制约和监督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执行与运作。“计划框预算,预算框计划”,就是国民经济计划与国家预算相互关系生动形象的写照。“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就是现实中国家与财政这种关系在理论上的经典概括。它从基础理论上证明了,如果没有财政制度的相应支撑和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是无法形成的,即使形成了也无法正常运转。

3. “国家分配论”确认了财政对整个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

国家要有效和顺利地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直接计划配置,是通过各项制度的安排来保证和实现的。“国家财政制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是国家直接配置财力资源的基本制度。财政通过自身的税收制度和利润上缴制度以及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集中了全社会所有的剩余产品价值(M)和部分的基本折旧基金(C),然后直接计划安排使用出去,其中最关键的是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直接决定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直接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结构格局,决定了生产和生活的状况。此时的财政制度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又以自身所能集中的财力支撑和确保计划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与国家实现自身职能需要的关系,即国家为了满足实现自身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才产生财政,这对于计划型财政突破市场型财政不能介入企业活动,不能参与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活动等根本局限,直接以财力去安排和配置整个社会的财力资源,去介入企业的内部活动,去安排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本解释。

4. “国家分配论”确认了财政对企业独立性的财力否定

计划经济体制以否定企业独立性为根本,企业作为国家的行政附属物是其体制基础。财政从财力上根本否定了企业的财务独立性,对否定企业独立性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1)利润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直接目的和利益所在,不能独立拥有利润,就无所谓企业的独立性。计划型财政不仅包括税收,而且企业的税后利润也全部被财政取走,在这种统收统支性质的财政制度下企业几乎是没有留利的。(2)投资是企业独立性的直接体现和基本保证,计划型财政取走了企业全部的投资财力并由国家安排投资,就从投资角度否定了企业发展的独立自主性。(3)财务是企业的“血液系统”,计划型财政使得企业的财务系统难以独立运行,必须通过与财政对接,通过以财政为中心的资金流出流进,才能完成企业资金的整个循环周转过程,使企业财务成为财政活动的附庸。所有这些,都在“国家分配论”中得到了说明与论证,“国家分配论”强调企业财务是国家财政的

“基础环节”或“基础”,就是这些状况在理论上的准确写照。

5. “国家分配论”确认了财政对整个社会公有化的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公有化,这是取消企业独立性的必然结果,其中基本的和主要的是国有化。此时整个社会大部分是国营经济,少数是集体经济,在国家财政制度和企业财务制度的控制下,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直接来自国营经济,大部分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国营经济。计划型财政收支的活动过程,也就是国营企业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在财政年复一年对国营经济投入的作用下,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不断稳固与强健。“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活动的阶级性,就为国家以财政为手段和工具全面支持公有化尤其是国营化,确保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复制并强化和扩张国营经济,提供了基础理论上的支撑和印证。

总之,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高度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制度,“国家分配论”产生并存在于这种财政经济制度环境中,支撑和印证着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财政制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充分体现出该理论的计划经济性质。

(三)“国家分配论”的合理内核

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决定了“国家分配论”具有其合理内核。

1. 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现在说“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性质的理论,有些人可能受不了,至少很反感。其实,如果时光倒流 40 年,说某个理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那可是充满荣耀与自豪的。因为它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核心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时的现实财经问题,很好地服务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那个时代的正确理论。但相应地,随着市场化改革导致体制基础的根本变迁,决定了财政基础理论转到“公共财政论”上去也是正确的。所以,现在说“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性质的财政理论并非贬义,只是对这一理论的客观描述与判断,更不等于说“国家分配论”是错误的。

2. 财政本质的分析

如果抽去了“国家分配论”的计划型“国家财政”制度或类型的内容,那么,它关于“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命题是正确的。“财政”这一范畴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跨越了若干经济体制形态,财政学作为它的理论总结与概括,就需要超越时间和经济体制的局限,给出一个在所有时间和经济体制形态下都适用的“财政”定义,即抽象地回答一般性的“什么是财政”这一问题。

尽管从亚当·斯密开始,财政学都是从国家收支角度来看待和分析财政活动的,但明确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分配,并且全力以赴为之争论和辩护的,并且关注重心几乎只集中在财政与国家的关系上,在林林总总的财政学说中,也许“国家分配论”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而只有“国家分配论”的分析和结论在财政本质和计划型国家财政类型高度相似,都是着眼于“国家”来把握与认识财政范畴的,从而人们习惯上是将两者混为一体的。这就使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从“国家财政”类型转向“公共财政”类型之时,似乎也需要根本否定“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这一命题,从而完全否定“国家分配论”。这显然是矫枉过正,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脏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

五、其他未解之谜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分配论”的“第一人”之谜大体得到解答,但其他若干未解之谜仍然延续至今。

(一)“头足倒立”之谜

“头足倒立”问题,是“国家分配论”遇到的最大挑战,几十年来,它始终处于无解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对该理论具有致命威胁。

对“国家分配论”的“头足倒立”质疑是这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分配”作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则属于经济基础。而“国家分配论”强调有国家才有财政,是国家产生了财政。这就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变成了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对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分配论”来说,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早在1964年的“大连会议”上,作为“国家分配论”对立观点“剩余产品价值决定论”提出者的王绍飞就指出:“财政是由国家决定的,是一种唯意志论的理论倾向,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有些同志解释国家决定财政不违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他们是如何绕弯,将中间环节抽掉,就是国家权力决定财政,上层建筑决定基础。”^①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余年之后,我国财政学新出现了“国家分配论”又一对立观点“社会共同需要论”。该理论对于“国家分配论”首要的质疑,就是国家产生和决定财政的问题。为此,“社会共同需要论”借用恩格斯评判黑格尔辩证法“头足倒立”的说法,称“国家分配论”是“头足倒立”的理论。

这两种对立观点对于“头足倒立”问题的辩驳攻防,集中出现在1982年11月于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财政基本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厦大会议”)上。这是我国财政学界唯一的一次只以财政本质为主题的理论讨论会。在会上面对“头足倒立”的质疑,邓子基是这样答复的。

首先,“绕弯”方式的答复。邓子基指出,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说国家决定财政,归根结底仍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经济基础决定财政,所以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换言之,国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财政之间的中间环节,通过抽走这一中间环节,其结果仍然是经济基础决定财政。对此,在“大连会议”上,王若飞就指出,不管怎么“绕弯”,仍然是国家直接产生财政,国家这个“坎”怎么“绕”都绕不过,还是没有解决“头足倒立”问题。

其次,“反作用”方式的答复。“绕弯”不解决问题,“厦大会议”上邓子基转而指出,国家决定财政只是“反作用”的结果。他说:“从根本的、最后意义上讲,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但我们不是机械唯物论者,而是辩证唯物论者、历史唯物论者,还谈反作用。……这个‘决定’与前面根本的、最后意义上的‘决定’有区别,不能把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说成是‘倒立’的,是‘唯心论’等等。”(邓子基,1983)但这样的答复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国家对于财政的决定作用显然不是“反作用”,这样的答复仍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最后,“财政萌芽”方式的答复。邓子基再次指出,国家的产生有一个萌芽过程,相应地,财政的产生也有一个萌芽过程,财政是从财政萌芽转变而来的。因此,财政是财政萌芽这一经济基础产生的,不是国家这一上层建筑产生的。但“社会共同需要论”很快就质疑:国家萌芽和财政萌芽谁决定谁?仍然还是国家萌芽决定财政萌芽,然后财政萌芽产生财政,仍然没能解决“头足倒立”的问题。

^① 见大会秘书处编写的内部材料《财政学讨论会简报》第19期第14、15页。当时王绍飞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形成正式论文公开发表,只好引用内部资料。

上述“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共同需要论”关于“头足倒立”问题的争论,“厦大会议”后邓子基的论文《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中有所反映,但涉及的只是只言片语,更谈不上反映了争论的全貌。本人全程亲历这次会议,上述文字是依据本人记忆形成的。

两论关于“头足倒立”问题的理论交锋,大体上到此为止,此后尽管人们还偶尔提到这一问题,但再没见到专论文章面世,更没发生大规模的会议争论。不过应指出的是,尽管有着这一严重缺陷,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分配论”始终得到官方的支持,并一直保持着主流地位,因而“头足倒立”问题就成为未决之谜而留存至今。

(二)“货币关系论”之谜

20世纪50年代,居于我国财政学主流地位的是“货币关系论”,但它的具体体系内容怎样,它是如何为“国家分配论”所具体取代等问题,云里雾里不得而知。几十年来,这些问题一直无人关注,当然也无须关注。但“货币关系论”毕竟是我国财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尽管它在我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从学说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些问题是不应当被忽略的。在撰写本文时,出于真正弄懂“国家分配论”来龙去脉的需要,本人尝试着去了解“货币关系论”的这些问题,但最终未能找到所需答案。由此产生的主要困惑就是,为什么“货币关系论”在我国财政学界没有真正扎下根去?(1)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财政学没有几本,而我国学者撰写的“货币关系论”性质的教材和专著连一本也没找到;(2)我国学者撰写的“货币关系论”论文,只看到周伯棣1956年发表在《财经研究》第2期的论文《论财政学的对象范围与任务》;(3)当时老师上课时几乎没有对“货币关系论”加以强调和总结,根本不像20世纪80年代上财政学时老师对“国家分配论”的大力强调和宣讲。这些都表明,尽管号称“主流学派”“主流理论”,“货币关系论”在当时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和深入程度是不高的,这也许是“货币关系论”很快就被连根拔掉的重要原因。

(三)为什么只有我国产生了“国家分配论”?

这是一个至今无人探究的我国财政学之谜。(1)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国家分配论”这一理论绝对是只产生于和存在于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没有产生“国家分配论”。按理说,中国不同于苏东国家,形成不同的财政理论也没什么奇怪。但问题是我国和苏东国家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国家学说等基本原理,都是立足于计划经济的体制根基来形成自己的财政理论的,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货币关系论”并奉行之,而我国另起炉灶产生了“国家分配论”?尽管我国与苏东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基础,各自的理论可以有“特色”,而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体系就不正常了,同一肤色的父母居然生下了黑白分明、肤色迥异的两个孩子,这是怎么回事?(2)学生也太高明了吧?从“货币关系论”到“国家分配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学生超过苏联老师,这是正常的,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这一超越速度也太快了些。许廷星大约是在1956年开始质疑“货币关系论”的,此时离新中国成立才六七年,离我们从苏联全盘搬入其财政理论才三四年,此时还处于如饥似渴地学习阶段,努力领会其理论还来不及,怎么就会从根本上对其质疑并否定之?或者说怎么就具备了根本否定苏联理论的学术水平?(3)如果换位思考,疑问就更多了。“国家分配论”取代了“货币关系论”,意味着苏联的财政理论是错误的;或者反过来,我国的财政理论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但问题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财政实践和理论建设已经走过30余年历程,应该已是高度成熟和完善的才对。一个大国,集无数理论精英,穷数十年时间,竟然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错误的理论中打转转!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是错误的理论,它如何能够顺利指导苏联多年的财政实践,而不造成灾难性后果?(4)我国财政学界转变何其快也!“货币关系论”在我国被“国家分配论”

取代,几乎无人为之辩解。可以说“货币关系论”被打得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依据现有文献资料,根本就没有“货币关系论”与“国家分配论”之间的理论过招,这种状况在学术争端中还是不多见的。(5)“货币关系论”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财政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财政制度大体是在1956年建成的,然而,正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国财政学界却开始否定“货币关系论”!此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越走越远,但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财政制度的基本模式并没有为我国所否定,尽管具体制度和运作方式有着中国特色,然而“货币关系论”在我国却是绝迹了!

现在回过头来思考,“国家分配论”之所以唯独出现于中国,可能与旧财政学仍然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一时期,尽管苏联财政学的影响日渐增大,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但毕竟还处于引进过程中,一时还来不及作为教科书在全国高校普遍推广。譬如“苏联专家鲍德列夫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但书中缺少对新中国财政经济实践的把握”(张敏,2018),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这种空缺状况,就给予了本土财政学以生存空间,诸如伍丹戈、丁方和罗毅、尹文敬等人就出版了有自己风格的财政学。而从他们的学识构成和理论根基来看,这些财政学论著只能脱胎于旧的公共财政学,而不可能是“货币关系论”的教科书。他们只不过是將公共国家分配观,改为阶级国家分配观罢了。至于“国家分配论”的各个基本要素,在旧的财政学中是随处可见的,只要将财政主体由“公共政府”转变成“阶级国家”,进而依据阶级观点取代公共观点去分析和推演,就站在了“国家分配论”的门口了。这时,许廷星将“阶级国家主体”和“分配关系”相结合,“国家分配论”就呱呱坠地了。

可见,正是沿着从千家驹—丁方和罗毅—尹文敬—许廷星这么一条主线最终完成“国家分配论”的创立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是否可以说“国家分配论”更多是发展“公共财政论”的结果,而不是扬弃“货币关系论”的产物?

六、“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的坚持和发展吗?

本文前面的部分介绍和分析了“国家分配论”的基本状况,下面介绍和分析“国家分配论”在新体制背景下的发展问题。

(一)体制改革下的“国家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是在与其他观点的激烈争辩中发展完善的,这不仅是一个坚持和证明自身观点的过程,也是一个尽可能吸收消化对立观点的合理因素为己所用的过程,其中诸如“剩余产品决定论”“社会再生产决定论”等的核心观点,都成为“国家分配论”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化和强化了其理论深度与力度。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以后在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上得到大力弘扬与运用。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分配论”从总体上看顶住了其他各派的冲击,即使改革开放初期遇到非常强劲的挑战,但仍维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各种观点都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根基之上,都具有计划经济的根本性质,由于“国家分配论”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契合性最深最强,从而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理论非他莫属,其他观点是难以撼动的。

然而“公共财政论”不同,它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即市场价经济体制的产物。“公共财政论”的出现,其结果已不仅只是理论挑战,更令人难受的是逐步取代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面对这种状况,“国家分配论”做出了种种回应。

第一,强调要“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出现不久,这一主张就出现了。1997年,邓子基在《财政研究》第1期发文《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其根本立论依据就是:“‘国家

分配论’高度概括了各种社会形态国家财政的共性或‘财政一般’的本质,也可涵盖特定社会形态国家的‘财政特殊’。”^①这是全文的核心观点,成为“国家分配论”也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新体制下该理论既可以“坚持”,又可以吸收“公共财政论”合理内核而“发展”的立论基点与依据。当然,此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构建中,“公共财政论”才提出不久,“国家分配论”的应对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分析和论证也是初步的,此后这种“坚持”“发展”观不断得到补充完善,但其核心观点与逻辑思路都来源于此。

第二,强调“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的“坚持、发展”。然而,如果只是强调“坚持、发展”,那仅是为自身的观点辩护,在学术论战中只是被动应付,于是就有了“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的“坚持、发展”的说法。如果“公共财政论”是“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结果,那么将“公共财政论”吸收进来,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国家分配论”完全可以华丽变身为市场经济性质的财政理论了。

为此,邓子基在2001年《财政研究》第7期上发文《关于公共财政的几点认识》,指出:“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②他进而指出:“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的基础上,在财政模式问题的研究上进行突破,从而实现‘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科学整合与发展,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国家分配论’财政学理论体系。”^③依据这一分析逻辑,将“公共财政论”纳入“国家分配论”框架内,论证了为什么说“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

应当说,在学术活动中,人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断深入探讨开拓之,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在新体制环境中坚持和发展“国家分配论”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坚持”“整合”“发展”应当是严肃的和严谨的。遗憾的是,“国家分配论”的这些推论和结论并不严肃和严谨。

(二)谁坚持、发展了谁?

如果说“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两者之间,能够将其中一个“整合”入另一个,使之得以“坚持”和“发展”而形成新的财政理论体系,那么,应当是谁坚持、发展了谁呢?

首先,公共财政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于1776年创立了财政学,这就是公共财政学,就是“公共财政论”的诞生,而此时“国家分配论”在哪里呢?如果“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坚持、发展的结果,那么至少要200多年后才有“公共财政论”,亚当·斯密的“公共财政论”是穿越的结果吗?

其次,公共财政学不讲国家(政府)主体?“国家分配论”是依据自己的财政本质观,将“公共财政论”说成是自己的坚持、发展的。它强调财政是国家分配,强调财政的国家主体,而好像“公共财政论”不讲国家分配,不强调国家主体似的。其实公共财政学从来都讲“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这只要看一下《国富论》就知道了,该书第五篇即财政学的部分,其篇名就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因此,公共财政学在创立伊始就讲国家收支活动,就讲财政活动主体是国家,此后近250年来始终如此。可见,讲财政是国家分配,其主体是国家(政府),并不是“国家分配论”的特权,“公共财政论”早在250年前就已经以“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为基点,形成了一整个财政学科,

① 转引自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六十周年丛书编委会(2007,第250页)。

② 转引自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六十周年丛书编委会(2007,第395页)。

③ 转引自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六十周年丛书编委会(2007,第402页)。

“国家分配论”是在 200 多年后才开始讲“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的,怎么人家就变成是你的“坚持”“发展”了?

此时如果一定要说谁坚持、发展了谁,那应当是“国家分配论”坚持、发展了“公共财政论”,而非反之。前文指出,“国家分配论”的来源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货币关系论”,一个是旧的公共财政学,而它们都建立在“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的基点之上。旧的财政学就不用说了。就“货币关系论”来说,其基本观点是:“财政学课程的对象是国家为了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以建立为进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所必需的资财而利用的国民经济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阿·米·毕尔曼,1955)尽管最终落脚点是“货币关系”,但讲的仍然是“国家”分配资财的活动,即国家主体的分配活动。这样,“国家分配论”的“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等要素,都可以在旧的“公共财政论”和“货币关系论”中找到,而它们又可以最终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公共财政论”上去,从这个意义上看,是否可以说“国家分配论”是“继承和发展”了“公共财政论”的结果?

最后,讲“国家分配”的都是“国家分配论”?如果说“公共财政论”是因为讲“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就被说成是对于“国家分配论”的坚持和发展,由于所有的财政学说都是围绕着国家收支形成的,那么,是否所有的财政学说都是“国家分配论”的“坚持、发展”了?这样的逻辑推理能力也太强了吧。

(三)“国家分配论”能“整合”“公共财政论”吗?

“公共财政论”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始终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点之上,其思维逻辑、体系内容等无处不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性和特征。相反,“国家分配论”起步于计划经济体制初创期,形成于绝对否定市场因素的体制环境中,它不包含市场因素和成分是正常的和必然的。

所以,尽管两论都讲“国家分配”和“国家主体”,但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经济体制本性,这才是双方的根本差异所在。在“国家分配论”那里,“国家分配”“国家主体”是一以贯之的,是从国家为了满足实现自身职能的需要而取得物质资料形成收入开始,以安排支出用于满足国家需要而结束,“国家分配”“国家主体”不仅是其立论基点,而且就是整个理论的本身。而在“公共财政论”那里,“国家分配”“国家主体”只是基点和前提,无须做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在这些已知的基点和前提下,整个理论立足于和围绕着市场经济,探讨着市场失效的弥补,解决“国家主体”如何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国家分配”。所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是有着完全不同体制性质的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我们这辈人初次接触西方财政学原著时,是受到极大震撼的,因为那是与我国传统财政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学说。只有在完全跳出“国家分配论”的约束和羁绊之后,我们才逐步开始理解和掌握西方财政学的本意。就本人来说,接触西方财政学之后,以往所学的东西中“财政是国家或政府收支”的观点却鲜明深刻地留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双方理论的差异是可以用中文与外语的差异来形容的,只能通过翻译才能理解,对于西方财政学也是需要通过“翻译”才能理解和使用的。

现在好了,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国家分配论”不得不将市场内容和因素纳入自己的计划型理论体系和框架之中,并努力通过“整合”将自己“发展”成市场经济性质的理论,这就需要将整个理论都移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点上来。这就需要在“坚持”国家主体的基点上,“国家分配论”全面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的分析,从而实现“国家分配论”与市场经济的契合。但这样的新理论,“公共财政论”的成分与因素已是主导性的,其内容基本上是市场性质的,它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体系与亚当·斯密财政学是根本一致的。因此,与其说“整合”后的新理论还是“国家分配论”,倒不如说它已“蜕变”为“公共财政论”了。

(四)“国家财政 = 公共财政”?

“国家分配论”为了“整合”“公共财政论”,还提出了“国家财政就是公共财政”的观点,并且指出“财政或国家财政天然具有公共性,因而也可以把财政或国家财政称为‘公共财政’”(邓子基,2000),为此还在多篇文章中更形象地使用了“国家财政 = 公共财政”的公式来表示之。这种说法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它代表了思维和逻辑的严重混乱。

首先,“国家分配论”也“不讲阶级”“不讲剥削”了?这些年来反对公共财政论的论著中,始终可以看到“不讲阶级”“不讲剥削”的指责。现在好了,“国家财政 = 公共财政”,是不是“国家分配论”也“不讲阶级”“不讲剥削”了?还是公共财政也是“阶级国家财政”了?如果是,那么,从尹文敬对旧财政学的批判开始,到此后“国家分配论”对“社会共同需要论”“公共财政论”的批判,人们应当如何看待?

其次,“国家分配论”变成“社会共同需要论”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发生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激烈论战,其中“社会共同需要论”备受争议的,就是它的核心概念“社会共同需要”一词。当时财政学界都心知肚明,“社会共同需要”就是“公共需要”,“社会共同需要论”就是“公共”性质的财政理论,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本性对“公共财政论”严重扭曲的产物。其典型表现就是由于当时“公共财政”一词太敏感,所以改为使用“社会共同需要”概念。不过,“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核心观点仍然是“财政就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也就是财政”。如果以公式表示之,就是“财政 = 公共财政”。由于在“社会共同需要论”那里,“国家财政”是“财政”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包含“国家财政 = 公共财政”的内容。

现在好了,“国家分配论”也主张“国家财政 = 公共财政”了,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1)“国家分配论”者是否也赞同“社会共同需要论”? (2)“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究竟谁对谁错,还是谁都没错? (3)40年前两论之间发生的那些大争论还有必要吗?这真的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再次,“国家分配论”变成了“公共财政论”。从“国家财政就是公共财政”的命题出发,可以得出“国家分配论就是公共财政论”的结论。“国家分配论”之所以给出“国家财政就是公共财政”的命题,其根本用意还是服务于“整合”,服务于把“公共财政论”说成“国家分配论”的从属理论和分支理论。但如果仅就这个命题本身来看,其含义反而是国家财政变成了公共财政,是事与愿违地把“国家分配论”变成“公共财政论”的从属理论和分支理论了。在这里,“整合”者变成了被“整合”对象,而被“整合”对象却变成了“整合”者了。

最后,我国进行的公共财政改革是必要的吗?依据“国家分配论”,有国家就有国家财政,现在“国家财政 = 公共财政”了,那么,有国家也就有公共财政了。换言之,人类几千年的财政史也就是公共财政史了,具体到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也是公共财政了,这样一来,哪里还需要进行公共财政改革?公共财政不是早就天然地、自动地存在于我国了吗?

参考文献:

1. [苏]阿·米·毕尔曼:《论财政科学及其各学科的对象》,《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10期。

2. 曹国卿:《财政学》,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

3. 陈启修:《财政学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4. 《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5. 《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第二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6.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版。

7. 邓子基、张馨:《论财政与国家的相互关系》,《财政研究资料》1984 年第 16 期。

8. 邓子基:《财政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9. 邓子基:《略论财政本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a 年第 3 期。

10. 邓子基:《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中国经济问题》1962b 年第 4 期。

11. 邓子基:《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中国经济问题》1962c 年第 11 期。

12. 邓子基:《为〈国家分配论〉答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4 期。

13. 邓子基:《学术前辈 首倡有功》,《财政研究》2008 年第 6 期。

14. 邓子基:《正确认识“国家分配”与“公共财政”》,《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0 年第 10 期。

15. 丁方、罗毅:《新财政学教程》,十月出版社 1951 年版。

16. 何廉、李锐:《财政学》,上海:国立编译馆 1935 年版。

17. 胡鉴美:《试论财政的本质与范围问题》,《学术月刊》,1962 年第 2 期。

18. 千家驹:《新财政学大纲》,三联书店 1949 年版。

19. 钱亦石编:《财政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 1935 年版。

20. 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六十周年丛书编委会:《邓子基财经文选——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六十周年(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年版。

21. 王传纶:《对“财政学”对象问题的探讨》,《教学与研究》1958 年第 7 期。

22. 伍丹戈:《论国家财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51 年版。

23. 许廷星、谭本源、刘邦驰:《财政学原论》,重庆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24. 许廷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重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25. 姚庆三:《财政学原论》,上海:大学书店 1934 年版。

26. 尹文敬:《国家财政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53 年版。

27. 尹文敬:《财政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28. 张敏:《为师为学 60 载 春风化雨润无声——专访“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叶振鹏》,《中国财政》2018 年第 13 期。

29. 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0. 赵春新:《关于国家财政性质等问题初探》,《光明日报》1961 年 8 月 21 日。

The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Academic Studies and Controversies

ZHANG Xin (Xiamen University, 361005)

Abstract: The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was the mainstream public-economics theory in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early stage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was important in China’s development of public-economics theor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arting with the concept of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ckground for its birth,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heory matches the planned economy. On this basis, it attempts to clarify some viewpoints and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Finally, it answers th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 public-finance theory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public-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tate Distribution Theory, Public-Economics Theory, History of Public-Economics Theories, Public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EL: E62, O15

责任编辑:汀 兰